

唐史研究丛书

遣唐使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

姚
崋
劍



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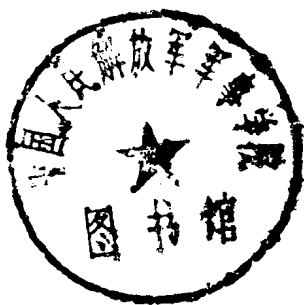




遣唐使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

姚嶂剑



唐史研究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史研究丛书

遣唐使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

姚 崧 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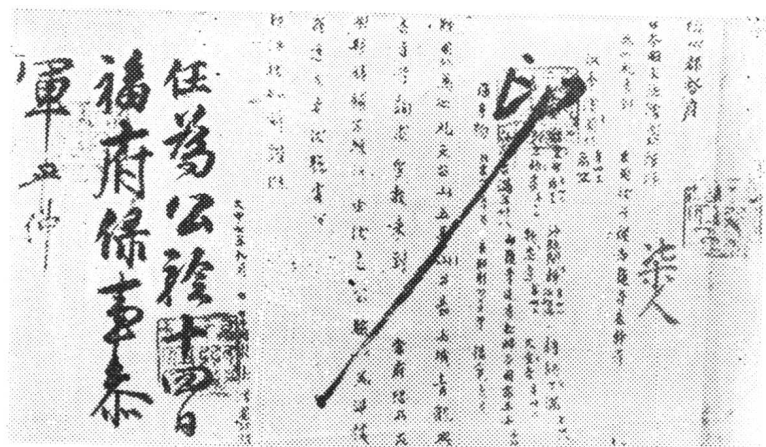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插页4 字数65,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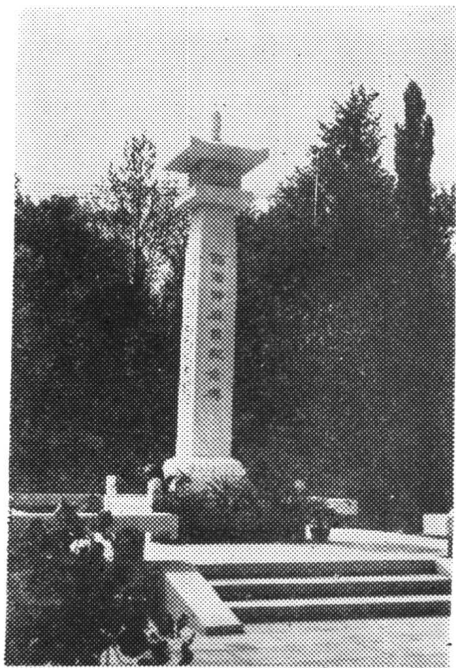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 11094·95 定价: 0.43 元



唐福州都督府发给日本遣唐僧圆珍等七人到长安等地求法的护照

西安兴庆公园里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日本学问僧空海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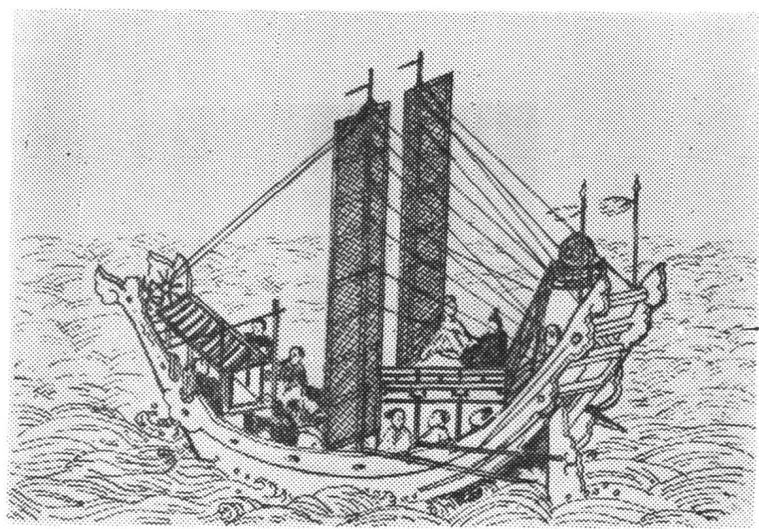


西安青龙寺里的空海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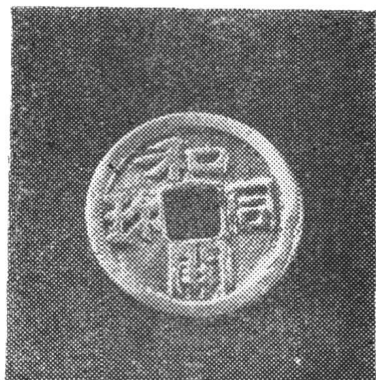
广东肇庆鼎湖山麓的荣睿纪念碑亭



遣唐使船（图画）



在日本珍藏的唐青龙镜



西安出土的日本钱币

60325/15

前 言

在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中，象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如此源远流长，如此频繁亲密，恐怕是非常罕见的。仅就文字的记载来说，中日之间的交往就有两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中，中日两国之间，除了在中国的元代、明代和近代有过一些极短的不愉快的时期和事件外，友好往来的历史，相互学习与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总是占着主流；就是在那些短暂的不愉快的时期，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仍然是脉脉相通，从未间断过。

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也犹如自然界的江河湖海一样，也有潮涨潮落和高潮与低潮，有时成汹涌的大河，有时为涓涓细流。如果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中日交流的高潮，那么，在中国的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则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中日交流的高潮。特别是在唐代的这个高潮中，日本在长达二百六十四年的期间，前后向中国派出了十九次遣唐使（包括三次送唐客使、一次迎入唐使和两次任命而未成行的遣唐

使），它不仅巩固和发展了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大批优秀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参加遣唐使团来到中国，把两国的交流推广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娱乐乃至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使两国的思想文化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系，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感情中播下了友好的种子。所以唐代的这次交流的高潮，对于中日两国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整个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把自古以来中日交往的涓涓细流汇成壮阔的大河，而且为以后中日两国世世代代的友好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以遣唐使为主要方式的唐代的中日交往，是中日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成功的一个光辉范例，其中有许多经验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当时日本的统治集团不惜为遣唐使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劳动人民不畏东海上的狂风巨浪，万里迢迢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唐帝国来学习，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繁荣，这首先说明当时日本的统治集团具有积极进取精神，也说明日本人民、日本民族有着克服困难、不怕牺牲、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优良品质。这种学习先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后一直被继承发扬下

来，已成为日本民族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日本民族在学习外国方面，既能采取“拿来主义”，兼容并蓄，又能通过自己健壮的胃囊，把有用的东西吸收消化，变为自己的血肉，无用东西则作为废物排泄出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大家都知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实现国家近代化方面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使日本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都是和日本民族学习先进、积极进取的精神分不开的。而这种精神正是和日本古代积极派出遣唐使，向先进的唐朝学习的精神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今天回顾唐代中日交往的情况，研究日本派遣遣唐使的历史，不但有利于中日两国世代代的友好，而且对我们当前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姚嶂剑同志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在大学学习时代就能在浩瀚的中日关系史中注意到遣唐使这个积极的主题，并能广泛地收集、整理、归纳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对唐代中日两国交流的全貌作了概括的论述，写成这本《遣唐

使》，这在我国当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还不多的情况下，应当说有着积极的推动的意义。而且今年恰好是中日恢复邦交十周年，这部《遣唐使》的问世，也算是为迎接中日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新高潮的一份有意义的献礼。

最后想附带说一句，姚嶂剑同志要我为他的这部《遣唐使》写篇前言，但我对遣唐使缺乏深入的研究，只是作为这部著述的最初的读者，谈谈自己以上的一点点感想，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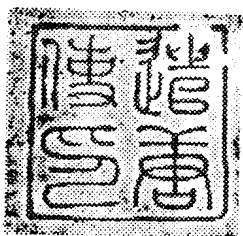
卞立强

1982年5月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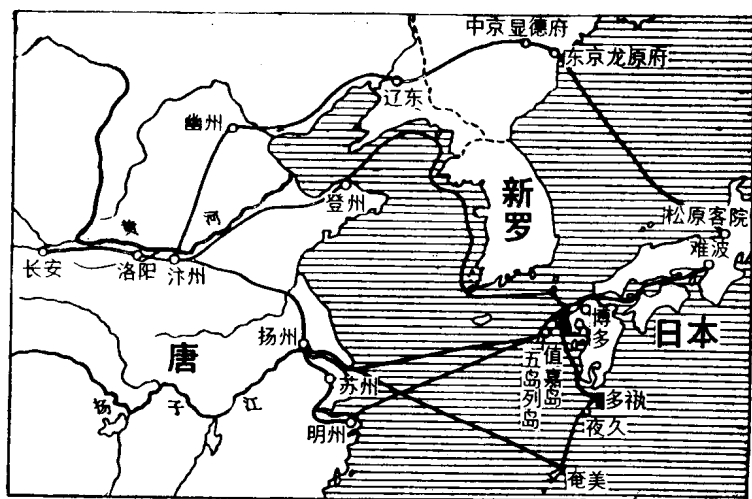
唐以前中日友好往来情况·····	(3)
汉晋时期的中日交往·····	(3)
遣隋使的派遣与遣使制度的建立·····	(10)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华经过·····	(15)
遣唐使之由来·····	(16)
遣唐使的组织结构·····	(25)
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28)
遣唐使的海上交通·····	(31)
唐朝廷的盛情接待·····	(35)
遣唐使在华生活简况·····	(40)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盛况·····	(46)
日本“大化改新”后的政体改革·····	(47)
日本仿唐的经济措施·····	(52)
唐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在日本推广·····	(55)
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61)
唐文学艺术花朵在日本开放·····	(67)
体育、娱乐活动方面的交流·····	(76)
唐科学技术在日本发展·····	(85)

日本汉方医学的形成.....	(93)
日本学问僧、请益僧大量西来 与中国佛教东传.....	(98)
日本民间的唐人风俗.....	(112)
后 记.....	(122)



遣唐使印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两国人民有着长达两千年之久的、有文字记载可考的交往史。特别是在中国的唐代，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



遣唐使海上交通路线示意图

文化及其它各个领域里的交流，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日本遣唐使^①以他们的卓越功绩，为中日友谊的壮丽史册书写了最灿烂夺目的一章，同时也为古代日本的繁荣和富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因此，遣唐使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传颂。追怀遣唐使的感人业绩，无疑有助于发扬光大传统的中日友谊，促使我们为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一美好愿望而共同努力。同时，就人类社会发展史而言，“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②，笔者希望通过对中日友好黄金时代的回顾，能够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迪，促使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继续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①遣唐使，在《日本书纪》中早期称“西海使”，在《万叶集》中统称“入唐使”。

^②毛泽东：《矛盾论》。

唐以前中日友好往来情况

汉晋时期的中日交往

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虽然海阔浪大，可是风媒已播送了友谊的种籽，中日两国人民开始隔海遥遥相望。

《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①，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史籍中有关中日交往的最早记录。所谓“百余国”，据考证，是指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日本弥生式文化时期）^②

①乐浪海：指朝鲜南部的海域。

倭人：我国古代对日本人的习惯称号。《史记》中记有徐福东渡的传说，香港学者卫挺生认为可信，详见《报刊文摘》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日本的神武天皇就是徐福》一文。

②公元前一〇〇年至公元二〇〇年，日本新石器时代晚期，大量制造一种褐色陶器，外型精美光滑。日本学者以一八八四年发现这一陶器的地点（东京都文生区弥生町），而称之为“弥生式陶器文化”，简称“弥生文化”。日本史亦称这一时期为“弥生式文化时期”。

的中期)九州族长统治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日本最初是以朝鲜半岛的“乐浪”(今朝鲜北部)为中介而同中国发生联系的。近些年来,日本九州北部一些部落酋长的支石墓中出土了三十多面中国汉代铜镜及仿制品,从而证实了这一记载是确切可信的。



汉委奴国王印

《后汉书·东夷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据日本学者三宅米吉考释,“倭奴国”即“汉的委的奴国”,“奴”即“雥”,位于今九州

北部福岡市附近^①。公元一七八四年,在今九州北部福岡县粕屋郡志贺岛的一块水田沟里发现了“汉委奴国王”蛇纽金印,证实了中国史籍最早一次有确凿年代可考的中日交往记录^②。

①三宅米吉《汉委奴国王印考》,载《史学杂志》第三编第三十七号。

②“汉委奴国王”金印在日本出土后,引起日本学术界争论。有三说:其一为“真印说”(承认是中国所赠,与中国学术界观点一致),其二为“伪印说”(认为是日本人自刻),其三为“私印说”(估计是日本人仿刻)。现在“真印说”在日本学术界占多数,因为大量的考古实物旁证了这一点。另外,发现金印的地点现已辟为“金印公园”。